



孙中山评传

下

An Analytical Biography of Sun Yat-sen

林家有 张磊 主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孙中山评传

下

An Analytical Biography of Sun Yat-sen

林家有 张磊 主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目 录

第六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与国民革命的高涨	569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569
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国共合作的实现	569
二、鲍罗廷与孙中山对改组国民党思想歧异的磨合	589
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演	601
四、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公布	611
第二节 黄埔建军	616
一、黄埔军校的肇建	616
二、黄埔军校的组织机构及管理	627
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	640
第三节 国民革命洪流汹涌澎湃	648
一、革命群众运动迅猛展开	648
二、革命武装力量的组建	664
三、黄埔学生军和滇、粤联军的第一次东征	669
四、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	676
五、孙中山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678
第四节 收回粤海关“关税余额”和镇压广州商团叛乱	690
一、关余事件对孙中山的困扰	690
二、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特殊意义	699
第七章 北上——最后的悲壮历程	721
第一节 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抱病北上	721
一、应冯玉祥国民军之邀北上实行“中央革命”	721
二、应皖、奉系军阀之邀北上谋求和平统一	732
第二节 绕道访日谋求中日俄同盟	739
一、绕道访日的目的	739
二、日本扶段（祺瑞）排孙（中山）的策略	744

三、日本与欧美列强扶段（祺瑞）排孙（中山）联合战线的形成	747
第三节 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努力	751
一、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北上态度的变化	751
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与国民会议运动的兴起	759
第四节 壮志未酬 伟人永逝	766
一、病逝北京	766
二、举国哀悼	771
第八章 孙文学说——中国近代化的理论先导	781
第一节 孙文学说的文化取向	781
一、孙中山文化取向的价值	781
二、孙中山文化取向的特点	791
第二节 孙中山中国近代化思想的内涵	796
一、近代化的前提	796
二、近代化的重要内涵	799
三、近代化的杠杆	800
四、近代化的必要条件	800
五、近代化的主旋律	801
第三节 民族主义思想	803
一、孙中山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民族革命”	803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	807
三、民族主义的新阶段	818
四、民族主义的几个重要问题	824
第四节 民权主义思想	832
一、近代中国民主主义思潮的高峰	832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权主义	837
三、民权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844
四、平等观与自由观	849
五、有关政体的构想	856
第五节 民生主义思想	872
一、革命民主派的“社会革命”旗帜	872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生主义	878
三、民生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889

四、民生主义的几个重要问题	895
第六节 五权宪法——分权主义与政治体制的构建	902
第七节 三民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906
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开端	906
二、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	908
三、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观	912
四、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917
五、社会历史观点——“民生史观”	923
第八节 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忠诚守护	930
一、并肩携手走过的十年征程	930
二、亲密的助手、战友、同志和伴侣	935
三、对孙中山革命思想、政策的勇敢捍卫和发展	941
结束语 传承孙中山的精神 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950
孙中山主要活动年表	960
引用、参考书目举要	998
主要人名索引	1013
后记	1022

第六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与国民革命的高涨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国共合作的实现

（一）孙中山思想的重大变化

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以此作为标志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只要是真正关心中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人们，都会对孙中山当年高瞻远瞩，多谋善断，排除一切干扰，不失时机地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表现出崇高的敬意和钦佩。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冷静地温习这一段历史会惊喜地感到，当年孙中山当机立断地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实在不容易，那是孙中山的精神和勇气的结果，也是他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具体反映，绝不能把它看作是孙中山的临时性决策，它是由许多内外条件促成的重大抉择。

从内部条件看，首先它是孙中山思想重大变化的产物。

中国国民党如果从它的前身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时算起，至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差不多已有20年的斗争历史，并且还领导革命党人取得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伟大胜利。虽然国民党的历史几经曲折，但它在当时的中国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党、老党和有影响的党了。作为国民党的缔造者和领袖的孙中山存在以我为中心的思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必对此有太多的指责和异议。在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以前，对于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国共产党，孙中山起初是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可是，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军事叛变后，孙

中山则改变了看法。这一方面是由于孙中山通过陈炯明叛变这一惨痛事实的教训，看到了国民党内部的离心倾向和争权夺利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是由于共产党人及时地给予他精神上的帮助，使他渡过了难关。因此，他对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充满了朋友间的感激之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

陈炯明叛变，破坏了孙中山的北伐大计，也破坏了他苦心经营的广东革命基地，这说明革命势力与反革命的势力已经势同水火。在南北军阀的夹攻下，孙中山只有一条路，要么坚持原来依靠军阀的立场继续失败，要么是倒向苏俄，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重新革命，推行新的救国政策。孙中山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但是，孙中山毕竟是一个过渡性人物，革命性与妥协性并存，旧观念的局限使他一时又不能与新时代的前进步伐相一致，这又决定了他一只脚开始伸出去探索联合新兴的革命力量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新路，另一只脚却依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单独联合西南军阀进行护法运动的旧辙之中。新旧革命主张“并包兼容”，虽然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新旧民主革命交替时期的思想特征，然而这种“并包兼容”在革命进程中则往往使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的发展，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已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最强音，并为全国人民所接受，以“恢复合法的国会、护法总统、护法政策”为标志的护法运动^①则逐渐失去存在的依据和感召群众的魅力。因此，孙中山在护法旗帜下，唤起的不是“闻有毁法者不加怨，闻有护法者亦不加喜”的民众，而是在军阀混战中失势的大小军阀和政客。孙中山1923年2月下旬重返广东民主革命斗争的战场，并在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孙中山三到广州，给人民群众带来新的希望，但他公开宣布的政治主张仍然是继续贯彻护法初衷，因此，他又不得不重蹈以往联合西南和皖、奉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对立的老路。孙中山以为有西南军阀的“武力”和列强的“外交力”，通过与皖、奉系军阀联盟，便可孤立和打击直系军阀势力，“终成护法之全功”，但由于轻视工农大众，结果又重蹈覆辙，走了回头路。这一切对于孙中山都是极为深刻的教训。教训之一，要革命，就绝不能依靠军阀的力量；教训之二，欲使中国独立富强，就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援助；教训之三，欲使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重视

^① 参见《李大钊的三篇佚文》，《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人民心力”，“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①。他意识到中国革命没有工农民众参加便没有基础，缺乏人民的支持，革命断无“可以决胜”的道理。正由于这样，终于促使孙中山寻求同盟者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从外部条件看，是他寻求帝国主义支持幻灭的表现。

孙中山为了实现革命救国的目标，曾长期寻求列强的同情和支持。早在1917年，孙中山就公开表示：“中国今日欲求友邦。不可求之于美日以外”^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对日本逐步丧失了希望，但又把主要精力用于寻求美、英等国的支持。1921年5月，孙中山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称赞美国是“民主之母，是自由和正义的护卫者”，并说：“历史上已不止一次地显示美国毫无偏见和友谊之态度，在我们有困难时给以援助。中国民主的成功多半源于美国的决定。”^③ 1922年5月，孙中山之所以没有同意达林提出的与苏俄合作的建议，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同德国的合作和获得美国财政及顾问等方面的援助有可能实现。^④ 陈炯明叛变、英美支持吴佩孚等给孙中山造成巨大的压力，使孙中山在1922年8月9日离粤赴沪的途中虽然明确阐述了与苏俄合作的必要性，但同时他又赞扬了英、美、法、德等国家。当时他认为：“美国素重感情，主持人道；法国尊重主权，又尚道义；而英国外交，则尊重利害，惟其主张，中正不偏，又能识别是非，主持公理，故其对外态度，常不失其大国之风，在在令人敬爱。”为此，他提出：“吾国建设，当以英国公正之态度，美国远大之规模，以及法国爱国之精神为模范，以树吾民国千百年永久之计。”^⑤ 但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并没有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报偿。1922年9月底，孙中山公开承认他愿与德俄这样平等待我的国家合作，同时又表示，只要列强也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他与苏俄合作的政策决不会妨害列强的利益，并指出，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仍需列强的帮助。^⑥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孙中山一方面积极发展同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另一方面继续同

① 孙中山：《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1973年版，第559页。

②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1001页。

③ 韦慕庭：《孙逸仙：屡经挫折的爱国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76年英文版，第102～103页。

④ 参见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116页。

⑤ 蒋中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上海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45～46页。

⑥ 参见《字林西报》1922年9月30日。

列强联络,以求得他们的谅解和支持。他曾多次指出,与苏俄的合作可能会引起列强的干涉,但他不希望这种干涉出现。他在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期间,曾极力缓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攻击和反对。在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中,孙中山坚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就是孙中山有意缓和列强对他和他的政府不满的最重要的宣示和措施之一。此外,1923年1月11日和19日,孙中山又先后两次派陈友仁访问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德尼·巴尔顿。陈友仁向巴尔顿暗示,如果英国及其他列强继续反对孙中山,孙中山就要同俄国、日本和德国进行合作。陈友仁还要巴尔顿向英国政府报告孙中山的这一态度,并说孙中山希望同港英政府首脑会谈。孙越会谈前后,陈友仁还多次代表孙中山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或同英美使者会见,阐述孙越会谈的目的及内容,预示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以图引起列强,尤其是英美对孙中山的重视。孙中山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甚至向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提出建议,要美国及其他列强采取联合行动占领中国各省省会,然后由美国或欧洲的专家和顾问帮助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对中国的军事、铁路、财政、河流、公共卫生和教育等各方面事业进行监督管理,如此进行监护统治5年之后,再举行全国的和各省的大选,所选出的领袖将全面接管国家管理权。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将由此产生。^①但是,列强对孙中山的建议、愿望和要求都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孙中山向舒尔曼提出的建议也遭到拒绝。美国政府还认为,孙中山上述要求和愿望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②英国及港英当局虽与孙中山进行了一番交涉,但它们向孙中山提出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要获得英国及港英当局的财政或贷款援助,要以广州政府的盐税做担保。^③这种企图奴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孙中山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当孙中山努力寻求列强帮助和支持,尤其是英美的援助均遭拒绝时,孙中山感到十分恼火,从而促使他对帝国主义的态度逐步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明显标志就是他公开站到反帝战线一边,与苏俄结盟。孙中山这个重大思想变化就为他联共、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① 参见阿本得:《受折磨的中国》(1930年英文版)第13~15页;里昂·沙曼:《孙逸仙:他的生活及意义》(1934年英文版)第250页。

② 参见史扶邻:《孙逸仙:一个顽强的革命者》(1980年英文版)第236页。

③ 韦慕庭:《孙逸仙:屡经挫折的爱国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76年英文版,第147页。

1923年下半年，帝国主义列强与孙中山的裂痕越来越深，最后终于发展成为公开对抗的形势，各国军舰齐集广州，围攻孙中山政府的战争一触即发。与此同时，苏联、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关系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10月6日，鲍罗廷作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来到广州，帮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改组，标志着孙中山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进入实际援助阶段的开始。鲍罗廷到达广州，立即受到孙中山的欢迎。孙中山强调他高于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举行北伐、统一全中国。而鲍罗廷则认为：北伐有大量工作要做，这就是国民党必须重建；一支独立的、没有军阀控制的军事力量必须创立；一所军官学校必须开办；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然而，孙中山并不同意这种办法，^①尤其是不同意鲍罗廷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主张。此外，孙中山对鲍罗廷所强调的共产主义、苏维埃主义与他的三民主义是什么关系在开始时也不了解，并产生疑虑。鲍罗廷为劝说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人同意进行国民党改组，反复地强调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但三民主义必须作新的解释。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决议阐述了共产国际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立场，并建议把民族主义理解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依靠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实现中国独立的斗争，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应导致建立地方资产阶级的政权；建议把民权主义解释成为中国劳动大众和一切进行反帝斗争人士利益服务的原则；建议把民生主义看作是将外国资本的财产实行国有化的方针。^②经过鲍罗廷和共产国际多次同孙中山联络，从而打消了他的顾虑。从1923年秋起，孙中山对共产主义已开始产生新的认识，这一新的认识首先表现在11月26日孙中山致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函稿中。过去，孙中山曾一再强调中国不能实行苏俄的共产主义，而只能实行他所创建的三民主义，现在，他则开始将苏维埃主义与他所承继的中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在致犬养毅的函稿中，孙中山明确指出：“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孔子的大同思想如何？这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① 参见丹尼斯·雅各布斯：《鲍罗廷来到广州》，《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第193页。

② 参见列兹尼科夫：《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第333页。

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① 这里暂且不论孙中山将苏维埃主义与孔子之大同思想等同起来是否正确，但这一类比却说明孙中山已开始接受苏维埃“立国之主义”了。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党员大会上作《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的演说，再次论述俄国共产党的革命主义问题。他说：“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又说，俄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其能合乎俄国大多数人心，所以俄国人民莫不赞成他，拥护他”。孙中山进而指出：“俄国革命，原本只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无民族主义。但其在六年间奋斗，皆是为民族主义而奋斗。若是，与吾党之三民主义，实在暗相符合。”孙中山认为，“吾党与他们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② 这样，孙中山就更进一步将苏维埃主义与他的三民主义等同起来了。12月2日，孙中山在对邓泽如等人于11月29日弹劾共产党案的批示中又明确表示：“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俄国革命之初，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及后与列强奋斗六年乃始知其用力之最大者，实为对于民族主义。”“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③ 这一批示比以前更明确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孙中山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调和起来，对于孙中山全面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和推动国民党改组发生重要作用。

孙中山思想的变化不仅表现在他对共产主义理论问题有新认识，而且还表现在他对世界革命理论问题的新论断上。

过去，孙中山曾长期寻求列强的支持，他的努力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而且列强还企图扑灭他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孙中山为此愤怒极了。这不仅促使他逐步树立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决心，而且还使他产生了联合

① 孙中山：《致犬养毅书》，《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536页。

② 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选集》，第546～547页。

③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61页。

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进行世界革命的思想。

1923年12月27日，为海关事件，孙中山致书美国国民。孙中山真诚地告诫美国的国民说：“当我们开始发动革命，以推翻专制腐败政府并在中国建立共和国之时，就以美国为鼓舞者和榜样。我们曾热切期望能有一位美国的拉法叶特^①同我们一起为这一正义事业而战斗。然而，在我们为自由而奋斗的这第十二个年头，来到的不是拉法叶特，而是一美国舰队司令率领较他国更多的军舰驶入我国领海，妄图共同压垮我们，以消灭中国的共和国。”并且指出，目前美国当权者或许竭力阻止中国的自由事业，不让这人类的自由事业得到别处的慷慨援助，但“这实是一种罪恶和永远洗不掉的耻辱”^②。正由于各国军舰齐集广州，意欲直接与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开战，这一举动使孙中山陷入极大的暴怒之中。12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大学与教授及学生谈话，愤怒抨击英美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他说：在十年内将要爆发世界大战。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将同印度、俄国、德国、阿富汗、波斯、美洲和非洲的黑人联合起来，为自由独立进行伟大的斗争。同月，孙中山在同北京大学克拉克教授的谈话中，又详细地说明了他关于即将来临的全世界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战争的理论。他指出：“中国在这次战争胜利以后，将获得自由独立，并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居于领先地位。避免这样一次战争毁灭性灾难的一条途径，是列强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在各个方面公正地对待中国。”孙中山还详细地谈到当时的苏俄政府，并且强调指出：“俄国和中国是天然的同盟者，这两个国家就在一起，将成为一个特别的、不可战胜的联合体。”^③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完全同意一切被压迫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结成统一战线的观点”，并以个人名义于1924年1月6日发布关于建立世界弱小民族反帝联合战线宣言，并指出：“我等同在弱小民族之中，我等当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帝国主义国家形成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不但为压制中国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亦不但为压制亚洲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且为压迫世界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因此，他号召“起！起！速起！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④但与此同时，孙中山又要求暂不要把这一声明“列入国民党新的行动纲领”，

① 拉法叶特（1757—1834），旧译拉斐德或辣斐德，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曾参加北美独立战争。

② 《香港日报》1923年12月20日。

③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75页。

④ 北京《晨报》1924年1月8日；《北京导报》1924年1月9日。

因为现在发表这个纲领“在策略上是不合时宜的”。他说：“国民党要是发表这份声明，就会把一切事情都弄糟。”^① 孙中山所说的“不合时宜”主要是担心在还没有统一全党认识的时候，就匆忙发表结成世界反帝统一战线宣言会造成党内的分裂，不利于他实施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的政策。1924年1月3日，孙中山亲自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2次会议，议决答复美国三藩市总支部对于国民党改组之来函，复函指出：“当俄国革命之初，施行共产制度时，确与吾党三民主义不同，至俄国现在所施行之新经济政策，即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相同，故非吾党学俄国，实俄国学吾党。”^② 这一切都表明，孙中山在革命与反帝问题上思想有了飞跃进步。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关系的论断在其思想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因此，当时人们就称赞孙中山“大有列宁之气象”^③。

孙中山思想的重大变化引起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注意和重视。1924年1月4日，鲍罗廷在给魏经斯基的信中指出，目前国民党改组工作“日趋进展，国民党要人头脑中已发生了大转折。这一点可以从孙中山的演讲中来解析”。鉴于此，鲍罗廷认为：“现在似可着手向他们灌输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精神，特别是将这一精神与他们的三民主义，以及他们对于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经济团体的态度结合起来。”^④ 1月18日，苏联《真理报》也刊登了苏俄驻北京通讯社负责人斯列帕克于1923年底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解放运动》。斯列帕克过去曾一度反对苏俄与孙中山合作，因为他认为，过去国民党改组一直停滞不前，“尽管很多党员都认识到了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只是“这个党的领袖孙逸仙博士坚持认为其首要任务是进行军事斗争，然后，当国民党征服数省之后，才能开展党务工作”。现在，斯列帕克却对孙中山进行了赞扬，认为在孙中山身上发生了巨大转变，即认识到必须首先开展党务工作，必须在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建立一定的基础，那时才能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斯列帕克还着重强调了孙中山

①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4页；又见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月20日。

② 《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台北1969年版，第1148～1149页。

③ 北京《晨报》1924年1月8日。

④ 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1页。

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宣布的一段话：“我们必须进行国民党改组，否则，我们在一百年间也不能完成中国革命”；“苏俄教导我们如何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一切”。根据各方反应，魏经斯基便于1月15日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在报告中，他明确指出：“最近半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国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断明确的过程，在国民党存在的十二三年里，这个党首次开始形成为一个国民革命的政党。根据它最近在华南关税收入问题上对帝国主义的攻击，根据它的反帝斗争和靠拢世界无产阶级可以看出，它走的是一条真正反帝的民族革命斗争的道路，并且正在同过去那种在帝国主义间纵横捭阖的策略决裂。这种思想上的进步可以从国民党人正开始寻求中国民众的支持并掀起政治宣传这一意味深长的事实上看出。”^①

综上所述可见，促使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思想进步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之一，是与过去半年内美国、英国采取不支持孙中山，而支持直系军阀曹锟的错误政策有关。曹锟的上台得到美国支持，它不仅意味着美国势力的增大，而且意味着中国最大的军阀派系——直系的加强。这一事实迫使孙中山和国民党迅速地表态和更加公开而真诚地联合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来应对当时复杂的中国局势。而且，这些变化又为国民党“一大”的即将召开及其宣言的起草和通过创造了条件。所以，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宣言”的通过，都是孙中山思想进步的重大结果。孙中山不仅赞成“宣言”的内容，而且他也号召全党贯彻执行“宣言”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国民党“一大”宣言，虽然是由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三方协商拟定的，各方都有保留，但无疑它真实地反映了孙中山当时的思想认识和态度。“一大”宣言通过后，虽然国民党有人反对宣言的原则和方针，而且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对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作了与“一大”宣言不合拍的解析，但不能为此就否定在国民党“一大”前孙中山思想的认识水平和重大发展，把他只看作是一位“从善如流”的庸人，或是被苏俄、共产国际代表主宰的凡人，这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一大”宣言的通过，实现国民党改组，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实施，都是孙中山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立志依靠新生的力量，争取以农工为主

^① 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页。

的广大民众的支持为挽救国家和民族而采取的果断措施，是他自身思想发展的结果。

（二）国民党“一大”顺利举行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1924年1月20日上午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①礼堂开幕。这次大会的举行和成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民革命新高涨的起点。

出席会议的代表，按临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每省区代表6名（孙中山指定3名、派选3名）。海外华侨每支部1名，海外各分部由孙中山指派10名。按当时全国24个省和广州、上海、北京、汉口4个特别区，代表当为168名，加上海外华侨支部代表13名和海外各分部代表24名，孙中山指派妇女代表3名，总共代表名额当为208名。但由于有数省交通不便、邮电阻滞，不能选举代表，或已指派代表而不能到会，因此实到人数比原代表应到数要少。据《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记载，在八天半的会期中，每天的出席人数多少不一。出席会议人数最多的一次是1月30日上午，达175名，最少的一次是1月28日下午，仅130名。究竟出席国民党“一大”会议的代表有多少，至今仍很难确定。^②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中国共产党员代表，除孙中山指定的陈独秀（未出席）、于树德、李守常（大钊）、谭平山、李永声（锡九）、沈定一、詹大悲、谢晋外，还有各地推选的代表林祖涵（伯渠）、

① 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于1924年6月与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组成广东大学。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为纪念孙中山，廖仲恺提议将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同年8月，广东大学第38次校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将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1926年7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

② 参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篇列代表名额165人（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287页）。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8辑，说“海内外代表额共为196人，当时出席者计165人”，但所附的名单实则是198人。《新民国》第1卷第4期所列举的代表名单实有194人，并说明“共计出席代表160人”。《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所载在大会发言的代表共220人次中，编号为134号的李宗莲和编号为176号的河南代表宋聘三等均未列入代表名单中。此外大会主席团成员5人中，除李大钊、谢持是代表外，胡汉民、林森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是候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还有大会秘书长刘芷芬等，均非代表。参与会议宣言起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的瞿秋白也非代表。会议代表当在200人以上，黄修荣在《国共关系70周年纪实》（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说，出席国民党“一大”开幕式共有173人。苏俄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说：代表大会由160位代表组成〔《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第411页〕。但实际出席会议的代表比应到会的代表少这是肯定无疑的。

罗迈（即李维汉）、夏曦、袁达时、于方舟、张国焘、赵干、毛泽东、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王尽美、刘芬（伯垂）、李能至（立三）、陈镜湖等20余人。

孙中山主持国民党“一大”开幕式，并致词。他把这次盛会称为国民党历史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孙中山从总结革命的失败教训，谈到恢复革命精神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希望大家团结起来，“用这个大力量去改造国家”。最后，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今天这个大会，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将来国史中的大光荣。我希望诸君努力，在这十天之内，把应该要做的事完全达到目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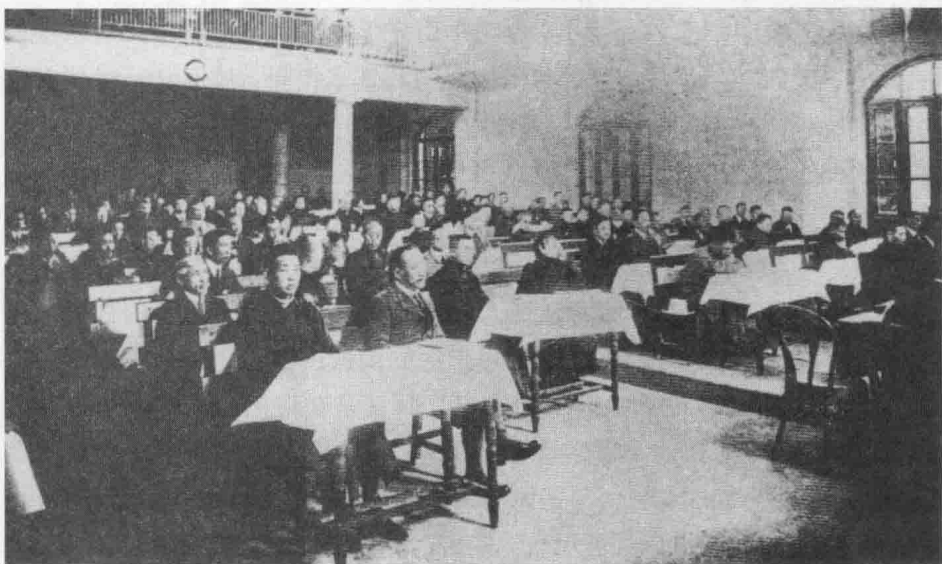


图6-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宣言”，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图为“一大”会场（今广州市文明路215号中山图书馆内）。

大会由孙中山指定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主席团领导。主席团成员有林森、汪兆铭、谢持、胡汉民、李守常等5人，轮流当会议执行主席，领导和主持会议各项议程的讨论和通过。大会历时十天（其中因追悼列宁休会三天），通过了宣言案、章程案；推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等重大事宜。各代表提议案和各省、各特别区暨海外党部党务报告案均

^① 体仁：《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记》，《新民国》第1卷第4期。

经大会表决通过，会议原议应办之事，既经办完，大会于30日下午闭幕。孙中山参加了闭幕式并致词。他简述了会议的情况，重点解释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孙中山说：“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从此以后大家分散到各地方要希望一致去奋斗”。“把革命事业做到彻底的大成功”。^①

国民党“一大”的重大功绩，在于它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讨论并通过《宣言》是大会重要的议程之一。

据周恩来的回忆，《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②。张国焘的回忆与其基本相同：鲍罗廷当时住在广州的东山，忙于起草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同鲍氏住在一起，任鲍的助手和翻译。大会的宣言草案，就是由鲍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③确切地说大会宣言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经过反复磋商、共同制定出来的。《宣言》从起草到定稿，都是由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和鲍罗廷四人组成的委员会，经过反复的讨论、审议和修改才完成的。每次讨论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都在场。孙中山有时也参加讨论。《宣言》最后由孙中山审定，而又是在他亲自主持下讨论通过的。孙中山临终前在他签署的遗嘱中强调：“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④可见，“一大”《宣言》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和指导国家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国共两党建立合作的共同纲领。孙中山谓此“宣言系全国代表大会之精神及生命”所在。^⑤

鲍罗廷起草的《宣言》草案是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作为蓝本制定出来的。共产国际这个决议同1923年1月《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及5月《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一样，都是为了促进

①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页。

③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316页。

④ 孙中山：《国事遗嘱》，《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9～640页。

⑤ 参见体仁：《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记》，《新民国》，第1卷第4期。